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成果丛书

主编：张道根 于信汇

中东变局研究 上卷

ON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余建华 / 主编

余建华 汪舒明 罗爱玲 傅勇 / 著

海外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国际安全学科项目

ON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中东变局研究

上卷

余建华 / 主编

余建华 汪舒明 罗爱玲 傅勇 / 著

导 论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是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率先提出的著名“蝴蝶效应”理论，2010~2011年末岁初，在北非小国突尼斯到中东阿拉伯世界，世人就目睹了一场现实版的“蝴蝶效应”。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吉德，26岁的失业青年布瓦吉吉摆摊售卖果蔬时，因无证经营遭“粗暴执法”、投诉无果而点火自焚，随之突尼斯全国各地猛然爆发如火如荼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浪潮。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携家属仓皇出逃沙特阿拉伯。执政23年的本·阿里政权在民众抗议运动的疾风暴雨中改朝换代。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这场政局剧变被称为“茉莉花革命”。更令国际社会震惊的是，“茉莉花革命”迅速在北非和西亚地区引发波及阿拉伯多国、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大变革、大动荡、大危机。

2011年2月11日，埃及穆巴拉克总统在民众抗议浪潮中被迫辞职；利比亚在北约军事干预下经过半年多激战，反对派武装于8月22日攻占首都的黎波里，推翻卡扎菲政权，两个月后卡扎菲被俘身亡；历经一年与反对派力量的殊死博弈，2012年2月27日也门总统萨利赫

以妥协交权换得豁免；与此同时，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面临由国内反对派抗议活动引发的国内暴力冲突和国外高压制裁的内外交困。可以说自2010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这场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大变局不仅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政治剧变，而且自西向东，从北非的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到西亚的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曼和伊拉克等，中东阿拉伯世界20多个国家中除卡塔尔、阿联酋之外，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动荡危机。面对其迅速蔓延、波澜壮阔之态势，社会影响冲击之剧烈，有人称之为“（欧洲）1848年革命”“1989年东欧剧变”的现代阿拉伯世界版。^①

本课题组在2011年7月在课题申请表上就课题研究背景如下写道：“中东变局是新世纪以来继2001年‘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影响全球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趋势的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变。这场缘由纷繁复杂的中东剧变将持续相当时年，目前仍处方兴未艾的深刻演变和推进过程中，呈现许多令人瞩目的新特征，更存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和难以预测因素，其态势、走向、前景和结局扑朔迷离。但可以确定的是，中东由此进入一个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频发期，这场社会政治大变局将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地区国家的内外政治，进而重塑中东乃至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给中国的和平发展事业增添了一系列新的变数，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截至本书成稿的2017年下半年，六年多来的中东地区形势演变，基本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从当下来看，不仅是已经逝去的六年和可预见的两三年，乃至今后更长岁月中，这场席卷西亚北非主要阿拉伯国家、缘由纷繁复杂的中东政治大变局，还将在深刻而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继续延伸，在地区动荡与阵痛中继续朝着“由变生乱、乱中求治”的总体方向发展。

^① Gideon Rachman, “Into the Tickets of the Arab Spring,” *Financial Times*, May 10, 2011.

固然，这场声势浩大的中东大变革爆发突然、来势迅猛，从中东各国现政权、包括阿盟在内的地区组织到地区之外的东西方各大国（集团），均有措手不及之感。然而通过现象看本质，这场中东变局看似事发偶然，实为中东阿拉伯世界多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运动积累迸发的必然逻辑，同时也是一系列外部国际因素影响推动下的历史产物。

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再读俄罗斯著名政治家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著作《揭秘：中东的台前与幕后（20 世纪后半叶—21 世纪初）》。普里马科夫在半个多世纪里曾以记者、外交官和国家领导人身份穿梭于中东各国，结交中东各国首脑政要，更是中东一系列危机和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和当事者。该书作者在 2012 年此书再版时就正在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专门增写一章。这位将社会实践与理论认识融汇一体的中东问题专家在修订版前言首段写道：“如果中东地区 20 世纪中叶以来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缺乏系统研究，那么就无法做到对中东地区目前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完整分析。”^① 笔者以为，这一真知灼见对我们更全面、系统地观察与解析中东变局颇有启迪意义！

这场肇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随即在阿拉伯世界迅速扩散的中东变局，实际上与中东国家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接轨和互动及其结果密切相关。从长时段和深层次上看，中东变局既是战后中东民族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曲折进程的阶段产物，在相当程度上是二战以来中东阿拉伯世界继民族主义革命、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三次社会政治变革浪潮；同时也是后冷战时代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全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大变化、大调整和大发展的地区表现。为此我们需要从全球层面的高度将中东这场政治大动荡、大变局置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长时段演化

^① [俄] 叶·普里马科夫：《揭秘：中东的台前与幕后（20 世纪后半叶—21 世纪初）》，李成滋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第 3 页。

过程之中加以考察，紧扣中东地区的主体地位和发展现状，分析中东地区在世界整体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揭示这场中东变局复杂深刻的外在压力和外部环境。

中东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人类最早文明发祥地之一。不仅悠久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和波斯文明均在此诞生和成长，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一神教也先后创立于此。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历经其后继者所向披靡的对外征战，到8世纪中叶已建立政教合一、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军事封建帝国）。随后数百年间，阿拉伯帝国进入其历史上最为鼎盛辉煌的黄金时代。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由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这两条基本纽带联系在一起，在吸收、融合东西方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了绚丽多彩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它传播到非洲、欧洲和亚洲大部分的广袤区域，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

对此后中东阿拉伯世界来说，7世纪以来这四五百年阿拉伯帝国开疆拓土、所向披靡，缔造伊斯兰昌盛文明的历史是其永远难以忘怀、时常为之自豪的辉煌篇章，也是在这之后历史进程中阿拉伯世界历次社会变革运动洪流的经久不衰、激昂人心的源泉动力，它始终与中东阿拉伯民众对民族复兴孜孜不懈的追求奋斗、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再现阿拉伯—伊斯兰历史辉煌的憧憬期盼——“阿拉伯梦”相伴相随。这是我们在思考与解析此次中东变局的历史方位和内在机理时所不可忽视或轻视的极其重要的视点。

11~13世纪先后来自西方与东方的欧洲“十字军征伐”与蒙古铁骑“西征”，带来了阿拉伯帝国的衰落沦亡。15~17世纪，中东伊斯兰文明又借助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迎来历史上的又一个强盛辉煌的时代。

早年阿拉伯人伴随伊斯兰教传播由阿拉伯半岛起家，创造过以中东为中心的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乃至16~17世纪土耳其奥斯曼、波斯萨法维和印度莫卧儿三大帝国全盛时期留下的辉煌伊斯兰遗产，世代代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民众所骄傲自豪。这份

曾在中世纪和近代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伊斯兰文明历史遗产，在之后的岁月中不时激励着广大穆斯林应对各种内外危机，追求重建辉煌的民族复兴的理想目标。这份历史遗产可视为以最终实现阿拉伯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伟业为归宿的当今这场中东政治大变局的文明底蕴。

19 世纪以来，中东广大地区国家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当人类跨入 20 世纪门槛之时，封建制度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促成被称为“亚洲觉醒”的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的觉醒。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伴随 20 世纪前两次全球民族主义浪潮，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现代中东民族独立主权国家体系基本形成。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建立，是中东地区历史飞跃性的巨变，标志着西方列强在中东的殖民体系“一去不复返”，中东民众作为自我主体性力量开始为中东社会历史进程开辟新的道路。在取得从形式到事实上不同程度的主权独立之后，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东民族国家建设成为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中东社会民众的主要历史使命。然而纵观二战后半多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残酷的现实却是，在全球和地区一体化日益深化的进程中，在全球和地区国际格局的制约和羁绊下，以实现民族复兴强盛伟业为目标的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历程却是异常的曲折坎坷。取得主权独立的中东各国在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完成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艰难行进道路中，始终难以摆脱制度探索、选择和实践的困境。

相当意义上，这场中东变局是中东阿拉伯世界继二战后二十多年的民族主义革命、冷战前后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三次社会政治变革浪潮，是前两者未完成使命——重振历史辉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延续、推进与发展。

二战后，英法在中东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中东国家独立后在各自历史传统基础上选择确立了共和制、君主制两大类政治制度，并被纳入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格局之中。冷战爆发后，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争夺新独立的中东国家。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国家以埃及纳赛尔“民族主义革命”为旗帜，积极倡导泛阿拉伯主义和民族主义，探索和寻求独立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突破美苏两极格局对中东的桎

桎。但是，冷战两极格局严重限制了中东国家在政治上的选择方向和发展空间，同时阿以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也造成中东地区的分裂状态，恶劣的外部国际环境严重妨碍了中东国家的制度建设。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苏冷战有所缓和，中东地区国际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阿以冲突逐步演变和降格，并以巴以矛盾为主，亲西方路线成为中东国家的主要选择，阿拉伯民族主义道路名存实亡。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中东伊斯兰世界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浪潮，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标志其达到历史高峰。这股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伊斯兰复兴浪潮，实际上成为战后中东社会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又一新尝试，也即继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民主运动之后的二战后中东第二次社会政治变革浪潮。

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本质上是针对伊斯兰社会内部现代化进程滞后与外部生存环境恶化的双重危机，强调运用伊斯兰文化传统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以重建伊斯兰辉煌文明。就整体而言，这一伊斯兰复兴运动明显具有积极因素与消极效应兼具的两重性。其使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受到严峻挑战与沉重打击，西方同其中的原教旨主义潮流尤其是激进、极端势力的冲突对抗加剧，也促使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激化。虽然在伊斯兰复兴运动浪潮中，中东穆斯林抛弃了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世俗反帝的军人政权治理范式，但随后事态证明，强调宗教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主张“伊斯兰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的伊斯兰主义这种范式同样被证明没有成效，而且激进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直接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无辜民众的暴力行为，更是削弱或葬送这种伊斯兰主义范式的社会基础。

二战后的近半个世纪内，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制约着战后中东政治发展进程的基本结构。冷战结束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上升，要让地缘战略位置关键、石油资源富庶的中东成为构建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田与突破口。由此美国在中东肆意推行赤裸裸的霸权政策，单边强权政治恶性膨胀。然而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

严重受挫，而且引起中东伊斯兰世界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的强烈反弹。美国在中东民主化、核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双重标准，以及西方舆论对伊斯兰的偏见和妖魔化，都让伊斯兰世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深感不满与愤怒。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非但没有深刻反省，从这一悲剧中汲取历史教训，反而误入反恐谋霸的歧途，对中东地区的傲慢和强权变本加厉。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广泛异议，绕开联合国、拖上英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坚持反美立场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夹带私利、蛮力强权而非对症下药的反恐行动不仅使美国自身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长期动荡和冲突的泥潭，国力严重受损，而且导致了“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势力重整旗鼓的“越反越恐”的严峻局势，这更是给伊拉克、阿富汗等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广大穆斯林带来惨重灾难，致使“9·11”事件以来的十年，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东民众的关系严重恶化；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则汹涌高涨，达到历史空前的新高度，但以恐怖暴力行事的“基地主义”也在伊斯兰社会日益失去拥趸。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中东国家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重新审视伊斯兰主义和西方道路，再次开始制度选择进程，锲而不舍地探索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之正途。

二

中东变局发生之初，连续执政几十年的专制强人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在民众反抗浪潮中相继倒台，一度使美国等西方世界兴奋不已，视之为开启中东民主化大潮的“阿拉伯之春”终于来临，其坚信“阿拉伯之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积极进步”。^①“1848年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如今，即使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阿

^① Gideon Rachman, “Into the Tickets of the Arab Spring,” *Financial Times*, May 10, 2011.

拉伯世界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况”。^① 西方媒体大肆宣扬这场具有深远影响的“阿拉伯之春”是“反独裁、争民主”的“阿拉伯革命”“阿拉伯觉醒”，其将使中东大踏步走向告别专制、迎来自由民主的美好前景，为此热切关注，学术界也掀起研究热潮，相关著述接连不断。^② 这场中东变局，无疑带有明显的反专制、争民权的社会民主运动性质，尽管其在后来许多国家的具体演进中变味、异化，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考察其与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联。

中东国家民主化是现代中东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在政治制度领域发生的进步变革。战后世界民主化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冲击与影响着中东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但在西方学界多年来流行着一种民主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③ 其本质上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偏见，它不是从伊斯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去分析民主化迟缓原因，而是强调伊斯兰社会对西方来说的异质性，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提供民主制度的合适基础，既否认了民主形式的多样性，也忽略了民主化其实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从历史事实来看，中东民主化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起步。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仿效西方近代政治的宪政实践表现为在奥斯曼帝国、埃及、伊朗发生的一系列救亡图存的社

① Mahdi Darius Nazemroaya, "Revolution: Is 1848 Repeating Itself in the Arab World?"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3096>.

② 相关文献包括：Kenneth M. Pollack et al.,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New Arab Revolt: What Happened, What It Means, and What Comes Next?* (New York, 2011); Tariq Ramadan, *The Arab Awakening: Islam and the New Middle Eas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Farhad Khosrokhavar, *The New Arab Revolutions that Shock the World*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 Mark L. Haas, David W. Lesch, eds., *The Arab Spring: Change and Resistance in the Middle East*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13); Marwan Muasher, *The Second Arab Awakening and the Battle for Pluralism*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James L. Gelvin, *The Arab Uprisings: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2015)。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116、117页。

会改革运动，它们拉开了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序幕。^①而在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中东民族民主进步力量在与殖民当局、封建王权斗争中进行了多次多党立宪政治的探索与尝试，乃至在众多中东国家赢得独立主权后，要么是在政权形式上直接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立宪的共和政体，要么是继续推进民族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由此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中一半以上是共和制国家，其政治与法律制度基本上仿效西方世俗的民族国家模式。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东地区也出现了政治民主化运动潮流，其以自下而上的群众性运动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政治改革两种形式相结合。

冷战结束后，美国力图通过在中东地区移植西方民主制度主导中东地区事务，但阿尔及利亚等国伊斯兰主义力量趁势异军突起的夺政势头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忧虑恐惧，从而暂缓了对中东阿拉伯国家民主改造进程的强行压逼，以免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其默认和支持中东地区的强人政治模式，以维护和拓展其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中东更为重要的现实战略利益。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通过政权更迭方式开启伊拉克的民主改造进程，试图在中东建立民主制度的样板。尽管其实效适得其反，但美国还是将极端主义猖獗归之于中东地区缺乏民主，民主改革被提升为解决恐怖主义根源的主要手段，为此拉上欧盟推出推动中东民主改革的“大中东地区伙伴关系计划”。中东国家对之心态复杂，一方面迫于美国的压力和依赖，不得不在民主化问题上有所松动，采取一些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担心民主化进程冲击国家稳定和执政地位。因此，中东民主化进程在潜移默化中展开，成为当前中东社会政治变局重要缘由。

直到跨入 21 世纪，中东地区民主化经历战后几十年探索实践的缓慢历程，伴随强化威权政权与推进民主政治之间的激烈交锋，其进程时有中断，并屡遭挫折坎坷，但其毕竟由个别国家的微波细流扩展到中东大多数国家，总体呈现由弱渐强发展趋势；但相对于整个世界政治演进步伐，中东民主政治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东民众极其

^① 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 26～36 页。

不满意这种落后于时代潮流的社会现象，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浪潮的意愿与相应举措也始终没有偃旗息鼓，包括将在独联体国家积极推动的“颜色革命”移植到中东，这从2005年美国对黎巴嫩“雪松革命”的兴奋与支持中可窥一斑。不少西方人士将2005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视为六年后爆发的中东变局的预演或序曲。^①

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未对2010~2011年末岁初的突尼斯和埃及政治剧变事先明确知晓，但这场阿拉伯世界政治风暴的发生，美国也摆脱不了干系，而且很快从措手不及过渡到有意识地鼓励和引导中东变局的战略实施。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外国政府的支持也是这次骚乱的重要外因。虽然这场阿拉伯剧变的爆发，根源或者说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战后中东阿拉伯世界多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日积月累，但同时我们不能无视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包括矢志不渝地强推西方式民主等战略手段在内的一系列外部国际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这场中东变局爆发的内外交合缘由同样要从经济领域入手考察与反思，即这场阿拉伯政治大动荡也是阿拉伯世界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长期处于落伍、边缘的不利境遇的逻辑产物。中东大变局的爆发，可谓体现了阿拉伯国家民众强烈要求从长期以来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国家发展困境”中突围的急切愿望。

中东各国独立后，从维护国家独立主权、摆脱列强经济控制、发展民族经济、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等目标出发，在二战后约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纷纷实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实取得了程度不等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额石油美元刺激，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东国家经济面貌大为改观。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的油价暴跌及其后长近20年的低油价持续，中东经济增长状况急转直下，中东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

① Mary-Jane Deeb, "Libya's Second Revolution," in Mark L. Haas, David W. Lesch, eds., *The Arab Spring: Change and Resistance in the Middle East*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13), p. 70.

的各种问题弊端也纷纷显性化，促使中东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普遍开展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但这几十年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指导的中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改革调整的整体成效并不理想。不仅多年来困扰多数中东国家的通货膨胀、债务负担、粮食危机和就业严峻等问题有增无减，而且加速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权贵官员贪污腐败、非法牟取暴利等不良现象的泛滥。

世纪之交以来，中东国家不仅面临社会经济发展各种不平衡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中东国家曲折前行的现代化建设又面临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的严峻挑战，致使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者——中东国家就其现实状况而言，在当代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日趋边缘化的不利境地。一方面，国际经济体系出现东升西降、南快北缓的增长走势，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出现大分化，以金砖国家成员等为代表的亚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群体性兴起，然而在中东地区，除了“沙漠中的经济奇迹”、以科技立国“小而强”的以色列和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等高收入的海湾石油富国之外，绝大部分中东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基本上还是初级产品生产与出口国，制造业普遍落后于拉美和亚洲其他地区，中东国家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水平已经明显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仅有土耳其可与之媲美，而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中唯一发展成功的新兴经济体。而阿拉伯世界中，唯一能挤进二十国集团的国家只有沙特阿拉伯，而这也主要是仰赖于这个国家得天独厚的富庶石油资源。这个情况与中东国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处于不利地位的结构状况相关。这些中东国家经济脱胎于殖民地经济，结构单一且畸形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等矿藏和其他农业原料等自然资源和低附加值初级产品，处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的底部和低端，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

因此，这场中东大变局的爆发虽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2006 年以来，部分有识之士正是从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国家发展困境”预料到，一场政治大动荡、大变革风暴即将降临中东。但这

场阿拉伯剧变爆发在 2010 ~ 2011 岁末年初这个具体的时间点上，应该说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波及中东有着密切关联。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东国家依附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陷入严重危机。伴随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欧元区经济衰退压力加剧，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东诸多国家资金的重要来源——侨汇、旅游、出口收入和外来投资大幅减少，经济增长疲软乏力，各国通货快速膨胀，债务本息偿还压力急增，严重财政收支愈绌，社会福利剧减，成为中东民众思变的直接导火线。如果说中东海湾产油国尚有多年积累的石油主权财富基金可济急，那么中东诸多非产油国则纷纷面临经济状况恶化、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快速上升，社会贫困和民生问题骤然突出，再加之这些年来，全球因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中东国家出现粮价暴涨和粮食短缺严重危机，而财政窘迫导致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实行的政府食品补贴政策难以为继，原先政府对国民的“以福利换支持”“以面包换稳定”的社会契约破产，社会矛盾和民众不满程度急剧上升，众多民众尤其是阿拉伯青年迷茫、屈辱、绝望之情如干柴烈火，急剧迸发。

所以说，源于这场祸及全球范围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激化的阿拉伯世界经济和民生问题，成为压垮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现政权摇摇欲坠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使数年前埋藏的潜在统治危机变成轰然崩垮的现实。

三

尽管在全球化时代，中东变局的爆发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视的国际背景和外部世界因素的推动，但就根源而言，这场中东变局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和阿拉伯性，即这场中东社会政治变革动荡潮的根本动因还是源于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内在结构性冲突。

这场中东大变局、大动荡是阿拉伯世界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大失败，也是阿拉伯社会系统性危机的一次总爆发。它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化

建设模式探索的严重受挫和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的严重失败，以及在此基础上阿拉伯社会民众的普遍不安全感和对现状的普遍不满。

其一，阿拉伯国家普遍的“不安全”状态。从建国伊始，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就存在国家（政府）与社会间、国家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它使阿拉伯国家普遍陷于脆弱地位，经常出现合法性危机，不仅难以充分开发和利用其自然禀赋，还导致外部大国经常因觊觎其自然资源或战略位置而频频介入该地区内部事务。这主要体现为：“强宗教”社会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深刻的世俗—宗教裂痕；西方殖民统治对这些国家的形态和构成产生深刻的影响，造就国家—社会关系的扭曲，种种跨界群体侵蚀主权国家的整合和治理能力；地区中小国家林立，分裂和派系斗争情况严重，国与国之间常常陷于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不仅未给中东带来秩序和稳定，反而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内在分裂和紧张。

其二，威权统治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滞缓。与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不同，阿拉伯世界的威权统治指向以“食利经济”为基础的“安全型国家”，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阻碍。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来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治理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国家权力向行政部门集中，尤其向最高领导人高度集中，其他政治权力机制弱化和虚化；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法治化程度较低，不少国家领导人长期实行独裁统治；依赖强权手段来打压反对派以维持统治，情报和安全部门权力巨大；特权阶层的存在以及从上到下的腐败成风，是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常态”，也使政权严重脱离人民大众；基层民众在国家公共生活的主体地位难以体现，基本安全和权利难以保障。就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而言，政府已经成为他们缺乏基本安全、遭受剥夺和排斥的重要源泉。阿拉伯国家的威权统治深深根植于阿拉伯世界内在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经济模式之中。阿拉伯社会传统的威权型的父权制和部族主义以及古老的贝都因部族主义仍然根深蒂固，阿拉伯社会缺乏克制、妥协、包容和契约精神。阿拉伯世界盛行的“食利国家”经济模式也为僵化的威权主义提供了经济基础。

其三，“食利经济”模式弊端积重难返，人口膨胀致“社会契约”难以为继。基于阿拉伯世界的自然禀赋，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形成了对外依附型、以原材料（尤其石油）出口为主的“食利经济”模式。以“食利经济”为支持的福利性补贴尤其形成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契约”的基础，即通过向民众提供公共部门职位和基本生活物资补贴，来换取民众的忠诚和支持。这一模式除了对政治体制进步带来消极影响外，在经济领域则导致“懒惰的计划”和“唾手可得的成就”，导致公共投资资金长期紧张，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压制了市场机制的成长和运行，阻碍了阿拉伯社会的私营企业的成长和企业精神的培育，也抑制了阿拉伯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就业创造能力。在人口规模较小时期，阿拉伯国家的“利”源普遍比较充足，“食利经济”运行顺利，“社会契约”也能很好维系。而人口的高速增长、“青年人口爆炸”现象、失业高企、过度和恶性的城市化使那些中低收入阿拉伯国家原有的“社会契约”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贫困化不断加剧，社会治理变得日益艰难。

其四，消极社会文化心理弥漫。长期以来伊斯兰文明的衰落、阿拉伯世界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利处境和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遭受的挫折，使阿拉伯世界内部蓄积起愈益浓郁的消极悲观情绪。面对严峻的现实，阿拉伯人民广泛地陷于对未来的幻灭、受挫和恐惧之中。虚无主义和绝望在当今阿拉伯世界比比皆是。以 21 世纪的标准来看，阿拉伯国家未能满足阿拉伯人民对发展、安全和自由的渴望。阿拉伯民众因政府对外的软弱无能和对内的压制深感绝望、不满和愤怒，受制于本能性的渴求、情感、热忱。投射愤怒的方向之一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阿拉伯社会存在强烈的反西方（尤其反美）情绪。另一愤怒矛头指向本国统治者的暴政。有组织的教俗反对派的兴起和联手，愈演愈烈的民众“街头政治”都表达了 21 世纪以来阿拉伯社会的绝望和愤怒情绪，并共同助推抗争性政治的恶性发展。

其五，抗争性政治的恶性发展。抗争性政治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阿拉伯世界尤其有着抗争性政治的文化基因。伊斯兰社会

具有固有的反当权派的特性，同时却又有着在短时间内动员巨量人口以挑战现状的能力。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强大伊斯兰组织是传统意义的抗争性政治主要载体。以“街头政治”为主要形式的抗争性政治也是当代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常有现象。20 世纪末以来，阿拉伯世界已经具备了新一轮抗争性政治爆发的土壤，以致中东变局以来，突发性、广泛性、传播性、联动性和高度情绪化的大众抗议运动和街头政治在北非西亚众多阿拉伯国家迅速蔓延。

其六，新媒体网络信息技术的助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各样的新兴社交媒体在中东地区迅猛发展，打破了政府垄断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局面，成为影响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这些新兴媒体的兴起，对原有的威权型政治体系有强大的解构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使中东国家政府难以封锁对其不利的信息传播，这导致了大量的愤怒和怨恨；其使新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方式发生新型化、革命化的重要转变，导致大量基于网络空间的政治行为体出现和发展；其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政治动员的方式和速度，明显加剧了政府社会治理与管控的难度。

由上观之，作为二战后阿拉伯世界意义深远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运动，这场中东变局凸显了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治理或者说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其突出反映在当代中东阿拉伯国家没有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自由化改革加剧社会不稳定。20 世纪末期以来，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秉持所谓“华盛顿共识”推进的自由主义改革带来进一步的社会极化和断裂，也严重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一味注重市场化、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的自由化改革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导致一系列动摇社会稳定基石的消极后果：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失业加剧、“权贵资本主义”盛行；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导致政权的统治基础明显缩小；执政党内部分化离心，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和能力下降；反对派政治实力上升，与政府矛盾加剧，社会抗争性政治加速发展。

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在考虑，还有什么出路能引导阿拉伯社会走出